

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 新世纪版



中国新闻史新修

◎ 吴廷俊 著

复旦博学·复旦博学·复旦博学

復旦大學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 新世纪版



博學

中国新闻史 新修

吴廷俊 著



JC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史新修/吴廷俊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
(复旦博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9-06146-8

I. 中… II. 吴…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教材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1014号

中国新闻史新修

吴廷俊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黄文杰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复文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9.75

字数 735千

版次 200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00

书号 ISBN 978-7-309-06146-8/G·762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吴廷俊，1945年11月出生于湖北天门，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兼职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新闻史、新闻教育学、网络传播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新记大公报史稿》（获第三届吴玉章新闻奖）、《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网络传播学导论》（合著）等。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在已出版多本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本集大成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著作。全书以时间为序，“上编”、“中编”和“下编”分别叙述了“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并用“补编”的方式叙述了我国台、港、澳地区1949年以来新闻事业的变迁史。作者认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形态特征分别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和“定于一尊”。这是“史实”的一条线。“绪论”和各章“简论”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史论”。基于各章史实，本书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在横向上论述了在中国环境中主要生长出了“利器媒介”、“喉舌媒介”和“官营媒介”；在纵向上论述了中国媒介发展的沿革呈现“承袭型”，发展的动力是“政治推进”，生存方式为“依附生存”。此外，无论是“史”还是“论”，本书对1949年以前的民营媒介和自由主义报刊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本书被方汉奇教授誉为“体例新，内容新，观点新”，“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开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理论勇气”，以及“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并认为此书于“史胆、史识、史才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十分难能可贵”。

序

拜读了吴廷俊教授《中国新闻史新修》一书,眼前一亮,觉得这是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有关的同类专著中的佳构,是一部从史实出发,不落窠臼,言所欲言,充满了新意的好书。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正规地说来,是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开始的。中经几个阶段,到20世纪的80年代,进入了它的繁荣期。从那时到现在,据有关专家统计,以“中国新闻事业史”或类似的文字命名的专著和教材,已不下60种。早出的几部,处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还能使人耳目一新,觉得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那一时代的写法毕竟两样。但后续出版的,在形式和内容上逐渐趋同,使读者难有新鲜感。

吴廷俊教授的这部新著不一样。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是框架新。它把一部中国新闻史分成“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共和国时代”三个大的板块,分别用形象化的语言“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作标题,以为区隔。其中的“帝国晚期”部分,以回溯的方式追记了“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即把古代报纸历史的那一部分也囊括在内。这种大的区分格局,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按古代近代史、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写新闻事业史的模式,既符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实际,又颇具匠心,颇有新意。

其次是体例新。例如古代的部分,不是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写,而是按“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和“合法民报”三种类型,分别开来,综合起来写。这是纵的方面。横的方面,则每章必设专节,以“本章概要”打头,以“本章简论”作结,以便于读者省览。其中,后一部分的内容,有点像《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沿用的其实是中国史家的传统,因为此前未被重视,使读者反而有新的感觉。

再次是内容和观点新。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举其荦荦大者,如绪论部分提出,“中国近代报纸不是在外报的根基上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而是中国原有的‘报’在近现代环境下借‘西国之报章形式’生长起来的”的观点。上编部分提出三种媒介的观点,即认为“喉舌媒介、官营媒介、利器媒介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中编部分提出,媒体区分为“营政”、“论政”、“营利”等三种类型;这一编和下一编中提出有关中国媒介生长的特征,以及各时期政党报刊具有不同类型的种种观点,都颇多新意。此外,第七、九两章,分别为半个世纪前一度被斥为旧政权“罪大恶极的帮凶”,建国后又屡遭批判的胡适,设置了专目,一个题为“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者”,一个题为“想为国家尽一点点力”,对这一历史人物作了正面的评价。这些,也都极富新意。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他的开阔的视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的理论勇气,和他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中国的史家历来有讲究史胆、史识、史才的传统,作者于此三者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文史是相通的。这一点在作者的这部专著中也得到了印证。其表现是既注意到史学专著所要求的严谨,而字里行间又不乏文采。但和作者曾获吴玉章新闻学奖的那部《新记大公报史稿》比较起来,这部专著的严谨程度有所增加,文学的语言则有所减少。这一迹象表明,作者作为一个出身文学,转而治史的文史兼通的学者,他的史学家的倾向更为明显了。

“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是我不久前对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提出的一项建议。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新闻史研究必须以“多打深井”和“多做个案研究”为基础。本书的作者,就是打过“深井”和做过“个案研究”的。他为了研究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曾经用四年的时间,通读了1926年至1949年这家报纸的全部藏报,对有关的背景和相关的材料做过深入的研究。此后,又从事过有关中国新闻史众多选题的个案研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他长时期“打深井”和“做个案研究”的结果。没有由此而得到的积累和功力,这样一部涉及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专著,是写不出来也是难以写好的。是为序。

方汉奇

2008年4月6日于北京宜园

绪论

突破“中体西用”：论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大家都说，中国近代报纸是舶来品，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到中国来的；可在我看来，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西人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仅仅是揭开了中国新闻史的序幕，正戏的开始还是在国人创办近代报刊之后；另一方面，国人创办近代报刊并没有沿着当时在华外报的主流——企业报纸发展起来，而是走了从政论到政党报纸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以为，中国近代报刊是在外报的启示下，吸取西报的形式，沿用中国古代报纸的内核，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再行设计的产物。正如今人桑兵所说，一些东西，“看似完全由西方移植引进，其实也并不那么简单……引进之时固然有所选择取舍，引进之后还要加以调整，尤其是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利用了我国已有的基础，或是不能不受国有条件的制约，因此在落实到中土的时候，发生了种种变异”^①。

这一点，梁启超早就看到了。他认为，报纸的本质是“耳目喉舌”，而能起到“耳目喉舌”功用的“报”在中国古已有之：“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者……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驹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由于中国报纸的发展“迟缓而无力”，致使“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②。“即自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循环日报》等近代报纸才在中国时兴起来^③。就是说，报纸的本质东西，我国早已有了；并且“邸报”发行，作为万国报纸的“先辈”，只是一直没有推广而已；通商后，西国报章形式传入我国，我国的报纸才得以恢复

^① 参阅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总序，三联书店。

^②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

^③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发展起来。

实际上,翻开中国新闻事业史和西方新闻事业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也说明,中国近代报刊不是在“外报”的根基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中国原有的“报”在近现代环境下借“西国之报章形式”生长起来的。

何以如此?新闻事业是一种文化事业,它必然受文化母体的影响,有其很强的传承性。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产生了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必然会在新闻事业上反映出来。《周礼·冬官·考工记》总序中有一句话:“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生长在淮南的柑橘移植到淮北,就会蜕变成味道苦涩的枳,这是由于淮北的“地气”使它变成这样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之十也有记载说:“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即使是相同品种,不同地方的水土也会使其结出不同的果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方水土里生长出一方新闻媒介,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媒介。这种情况符合“媒介生态”理论。

所谓的“媒介生态”理论,是指援用生物学中“生态”、“生态系统”等概念建构出的一种新闻媒介研究理论。生物学中的“生态”,表述的是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及其与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将“媒介生态”理论作为新闻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就是研究媒介群落之间、媒介个体之间的竞合以及与生存环境之间如何保持动态平衡^①。这里说的媒介是既包括外部形态又包括内部运作的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即新闻事业。

一、中国环境与中国媒介

中国的媒介生存环境怎样?这种生存环境中生长出怎样的媒介?

1. 中央集权制与“喉舌媒介”

说到中国的特征,首推国家体制层面即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振长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扫平六合,统一中国,拉开了中央集权制的帷幕。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是“秦中央集权国家

^① 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

制度的两大支柱”^①。“三公九卿制”是关于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设置的制度，而“郡县制”是关于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制度。这一年，因丞相王绾请封皇子为燕、齐、楚王而引发了廷尉李斯与其他大臣关于继续封国建藩还是实行郡县制的争论。李斯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则安宁之术也。”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由此中国废分封、设郡县，郡县两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成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为了更好地行使中央集权，秦始皇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体措施，主要的有统一货币、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

秦始皇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被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沿用，还不断地被加强。隋炀帝建立科举制，用考试方法来选举进士，把选举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大族手中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史家以为：“隋的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更为加强了。”^②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赵匡胤称帝后，吸取唐后期“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杯酒释兵权”，解除重臣宿将掌握禁军的权力，把所有军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采取措施，“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路的行政机构），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③，将政权、财权、军权全部集于中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一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但是，存在了2132年的中央集权制似乎没有随之被埋葬。1912年1月1日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是空有其名，并无其实。很快，“民国”变成了“军国”、“党国”，1928年8月国民党开始“训政”，全国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④。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又规定：国民党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独负全责”。可见，所谓“训政”，就是“以党治国”，就是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一党专政。

“国家结构形式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历史连续性。当今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单一制，英国的地方自治单一制，法国中央集权单一制和瑞士、德国、美国的分权制衡联邦制，基本方面的很多内容和特点往往上百甚至上千年都没有太大变化，尽管其间经历了不止一次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和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它们却依然故我。……中国、法国国家结构形式中的中央集权神韵等，都是一代

① 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② 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③ 《范太史集》卷二十二，《转对条上四事状》。

④ 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6页。

又一代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下来。”^①易中天说得更明白：郡县制的特点是“天下一统，四海为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②。

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机器要保持正常运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政令畅通，就是将朝廷的政令、皇帝圣旨迅速地、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第二个是举国“听一”，“听一”，就是听最高当局的。要做到政令畅通，就必须有畅通的渠道；要举国“听一”，就必须有令举国“听一”的手段，刊行官报就是迅速传达政令的一条很好的渠道，也就是宣达皇权、统一行动最好的手段。报刊，本来是一种大众传媒，但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其主要功能成了政府、政党发号施令的喉舌，成了政府和政党的“喉舌媒介”。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的主流媒介均为“喉舌媒介”，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新闻史上，没有哪一种理论比“耳目喉舌”论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长久。

“耳目喉舌”论从它正式问世之日至今有 110 多年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耳目喉舌”论前后经过了四次演变。

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耳目喉舌”论的是梁启超先生。1896 年，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道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忧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功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梁启超从“有益于国事”的高度立论，对“喉舌媒介”作了全面论述：在功能上，既强调“耳目”作用，又强调“喉舌”作用；在所属上，既强调属于国君，又强调属于臣民；在传播方向上，既强调纵向的通上下之情，又强调横向的通中外之故。梁启超希望通过“喉舌媒介”实现“去塞求通”，使内外交流、上下了解，达至和谐、统一的境地。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亲自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因此他的“耳目喉舌”论增加了新的内涵。1901 年 12 月，梁启超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说：“报馆者，国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此时，他的“喉舌媒介”是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出发点的，所以，作为“喉舌”的媒介是属于“国家”的，是一个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的社会系统。遗憾的是，梁启超期盼的这种“耳目喉舌媒介”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属于“稀有媒介”，除了像《大公报》这样极个别的报纸外，几乎找不到了，更没能成为主流

① 童之伟：《国家结构形式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 页。

②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2 页。

媒介。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报纸视作政党的“喉舌”。孙中山说：“《民报》成立，一方面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面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①孙中山的“喉舌媒介”主要作用是宣传主义，为政治运动的开展制造舆论。因为在他看来，“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既然人群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之分，那么利用报刊制造舆论，教育民众，是先知先觉者的天职。因此，他要求《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将同盟会的纲领，“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②。孙中山的“喉舌媒介”思想是建立在思想支配行动这种认识论和英雄史观的基础上的，所以，他的“喉舌媒介”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是看重“言”的功能，重“喉舌”，轻“耳目”，赋予媒介“宣传主义”、“力辟谬说”的任务；其二是在“言”的方式上强调单向“输灌”和“鼓吹”；其三是强调“喉舌”为政党所支配、所运用。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年代，接受苏联布尔什维克报刊理论，反复强调“党报是党的喉舌”，同苏联布尔什维克一样，实行“机关报”体制，以“党委机关报”代替“全党报”。1941年2月6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社论，说“《新中华报》便是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见的有力喉舌”。党报如何当好“党的喉舌”呢？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的名言指出：报纸应该成为党这个“集体的宣传者与集体的组织者”。所谓宣传者，就是忠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在自己的篇幅上，在每一篇论文、每一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使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所谓组织者，就是一方面“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一方面“响应党的号召，或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③。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媒介”理论从革命年代一直沿用到建设年代。

与孙中山的“喉舌媒介”论相比较，中国共产党除了同样强调媒介“言”的功能，强调政治宣传之外，还把“言”的功能的发挥落实到组织系统上，用组织监督媒介，保障其宣传功能的实现。

① 孙文：《中国之革命》，《中山全书》第4册，1935年版。

② 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③ 《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社论。

2. 帝制传统与“官营媒介”

始于秦王朝延续到清王朝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君权政治:“君临天下”,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当初,秦嬴政自称始皇帝,不是用一个简单称号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是有其实实在在内容的。他在设计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等国家官僚机制时,皇帝是不在其内的。皇帝乃天子,置于权力系统的顶端而不受权力系统的制约;皇帝权力由天授予,以“奉天承运”的天赋权威“君临天下”。皇帝不是国家行政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历代行政法典中没有任何关于皇帝的条款,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决定一切,制约一切,主宰一切。

秦嬴政为皇帝所谋取的如此大的权力,后来者还不满足,还要不断加以扩大。

汉武帝之后,东汉的刘秀“退功臣,进文吏”,使皇帝“总揽权纲”;“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使三公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权力集中于尚书台,而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

隋文帝改革官制,建立“三省”,分担秦汉时丞相的职责,加强和巩固了皇帝的权力。

明太祖朱元璋“罢丞相”,“自操威柄”,使六部事权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设锦衣卫,使其监视各级官吏图谋不轨行为。明成祖又设特务机构——东厂,由宦官提领,权在锦衣卫之上。厂卫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君权。

清王朝建立,承袭明朝的政治制度,并进行调整,使皇权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雍正时期,废止议政王大臣会议,改设军机处。军机处总揽全国军政大权,在皇帝掌握下经办一切军政要务,成为中央施政发令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办事过程中,军政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一切政令都要“钦承宸断”,历史上丞相制度由此告终。清朝皇帝真正做到了集权一身,权力不受任何侵犯,君主专制达于顶点^①。

至于“中华民国”,实为“党国”,甚至是“军国”。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总裁制,选举军委会主席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规定国民政府要受军委会节制,这样一来,蒋介石不仅是海陆空最高统帅,而且是国民党总裁,还节制国民政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把“一党专政”推向一人独裁的地步。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几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

^① 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盟为基础的、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应该说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在国家政体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尤其是在曾经的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党内生活、社会生活中民主越来越少,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标榜下,在一段时间内(即“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变成了“一言堂”,连国家主席被诬陷打倒时声辩的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行动的建议者是“春秋公羊家”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钦定儒家思想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以“礼”为核心的儒术,经过董仲舒发展后,不仅为西汉的中央集权统治而且为此后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①这样一来,君主不仅控制了全国的权力,而且控制了全国臣民的思想。全国只允许一个人有思想,不允许其他人有思想,其他人只能以此人的思想为思想,否则,就是“异端邪说”,就是“杂音”。

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全部集中于“君主”一人的“君主制”,其要害是民主的缺失:国家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了一人专有的私器;民众对国家事务的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完全被剥夺;同时,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思想权也被剥夺。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对民众惯用“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对民众封锁消息,一切对老百姓保密。因此,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对媒介都是采取控制的原则。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大量发展和培植官办媒介,另一方面对民营媒介百般打压,乃至扼杀。

翻开中国新闻事业史,我们可看到官营媒介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先的主流的位置。

古代虽然有三种类型的报纸: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和合法民报,但是官报明显占主流。从时间上来看,从唐代的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到清末的1100多年时间内,朝廷官报始终存在,即使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和光绪被迫流亡西安那年都未中断。直到19世纪末,才为新式官报所取代。再者,合法民报《京报》从本质上来看也是一种官报,因为内容只不过是官报的翻版而已,并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且发行机构报房也是从发行官报的官报房中分化出来的,以至后来对报刊的记载,邸报、京报的概念常被混用。

近代向西人学习,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最先成气候的是新式官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征求善后之策,英国人李提摩太建议创办官报。次年,总理衙门准许将维新派所设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派孙家鼐主持,除译刻书籍外,还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译报》。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些官报被迫停刊。庚子之役后,随着慈禧“新政”的推行,新式官报很快恢复起来,并发展到全盛^①。首先是地方官报的创办,然后是中央官报也发展起来。1907年,中央政府官报《政治官报》正式创刊。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还出版了许多专业性官报。清末十年间,全国出版的官报,总数达百种以上,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报体系。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人士创办报刊,戈公振先生认为是“民报勃兴”,其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维新派报刊,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国搅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朝廷力量的推动,得到朝廷尤其是得到了光绪帝的首肯和支持的。再者,康有为等人本来就是官身。所以,维新报刊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取得官方支持,获取官方资本,利用官方推广发行,等等。

进入现代,在两极环境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两党的新闻媒介无疑都是官办的。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全国山河一片红”,所有媒介全部国营,100%的媒介均为官办媒介。

与此相反,民营媒介的命运十分不济:好运不多,厄运连连。古代的“小报”,一直处于非法状态,朝廷视之如洪水猛兽,在皇帝谕旨和大臣们的奏折中,谈到小报时,不是“当重决配”,就是“严行禁止”,更有甚者,将办小报的人杀头治罪。清代雍正时期,何遇恩、邵南山被杀,开中国报人因办报喋血的先河。进入近代,国人创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惨淡经营,有夭折的,有挂“洋旗”的,有寻求官方保护的,有被查封的,即使是得到光绪帝支持的维新报刊,也因慈禧一翻脸,被全部查禁,报人谭嗣同等人身首异处。

进入民国,“民间报纸受歧视”的状况更为严重。其一,在两极的夹缝中两面受攻击。尽管它们总是不断地“察言观色”,不断地“选择方向”,还是难以生存。其二,在国民党庞大的党报体系面前,民营报刊失去平等竞争的权利。这种不平等主要包括新闻来源不平等、新闻传递不平等、白报纸分配不平等等。其三,在封报捣馆的灾祸中,民营报馆首当其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政府对于民营报纸的政策还是扶持的,但是由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6页。

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在急速的“公私合营”运动中,私营媒介“敲锣打鼓”地接受“合营”,导致私营媒介从此在中国大陆的消失。在往后的时间,创办私营媒介成为禁区,尤其是论政性的民营媒介,似乎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在一个有深厚论政传统的国家,民众谈论国事竟曾禁忌重重,实在令人感慨。

3. 内忧外患与“利器媒介”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不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加外力拽进来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强制中国改变自身的运动方向,中国以此为契机进入近代社会。因此,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景况,用“内忧外患”四个字足以概括!

一方面,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独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丧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强烈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逐步变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地和原材料供应地。一句话,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接踵而来的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国一次次的惨败,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掀起了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狂潮。

中国救亡图存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清政府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早在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就已经显露衰败,整个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沉醉于糜烂生活之中。中央官吏贪赃枉法,公行贿赂。地方官员勒索民膏,心狠手辣。军官也腐败,致使军队战斗力减退。特别是英国将鸦片走私到中国后,不仅造成大量白银外流,银价飞涨,市场紊乱,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困难,尤其是一部分官员和士兵吸食鸦片上瘾,使得统治集团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渐至不堪一击的程度。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把巨额战争赔款通过增税增捐等各种途径转嫁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头上,大大增加人民负担,加上黄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年水灾、旱灾和蝗灾,天灾人祸,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以上的情景,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早熟。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业经济的发展”^①。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的条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中国资产阶级一诞生,它看到的不是“人间的美好”,而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一方面外国列强气势汹汹,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页。

瓜分中国,一方面是本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主权被侵,白银外流,生灵涂炭。如何救亡图存?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中国资产阶级刚一降生,就碰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进行经济积累,也没有时间为自己建构完备的思想体系,民族资产阶级挑起了“救亡图存”的重担,在政治上早熟起来。

另外,政治早熟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进行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作为本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中国资产阶级来不及为自己培养知识分子就已经“重任在肩”了。与此同时,由于国门的被打开,西方文化的“侵入”,第一批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封建士大夫,其世界观渐渐发生变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坛上历来就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气象。中国文人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烈的政治意识是中国文人区别于西方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并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文人传统。他们向往民族兴旺、国家富裕、人民强盛。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他们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接触后,这种政治责任感更加强烈。于是,刚刚坠地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积累财富,就开始着手从政治上寻求“救亡图存”的武器。

报刊是早期资产阶级看中的最好的救国“利器”。中国觉悟的封建士大夫对近代报纸“情有独钟”。他们看重近代报纸,首先不是视之为“新闻纸”,而是视之为“传达纸”,传上下之意,达内外之情;他们运用报纸,不是用来刊载商品行情,发展商贸事业,而是运用报纸“立言”,宣传政治主张,推动维新变法。

林则徐创办《澳门新闻纸》作为“备采夷情”的利器;王韬把《循环日报》当作“立言”、宣传维新思想的讲坛;面对清政府听任外人办报、不准国人办报的现实,郑观应愤怒地说,报馆为“国之利器,不可假人”;梁启超更是大声疾呼:“报馆有益于国事。”于是,维新派人士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把“办报达聪”、“去塞求通”作为开展政治运动、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手段;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报纸看作“舆论之母”,利用办报纸为革命运动制造舆论。

进入民国后,国家形势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更加恶化,先是旧军阀割据混战,后是新军阀争权夺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从东北践踏到华北,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全面抗战,“东北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形势更加严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报人也和全国民众一道发出“怒吼”!在国乱期间,许多有良知的报人,包括一些私营企业性报纸老板都继承先辈报人的爱国传统和政论传统,为国家兴衰、为民族存亡置生命于不顾而大声疾呼。邵飘萍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林白水因抨击封建军阀而殉命;为宣传抗日救亡,邹韬奋被捕入狱,史量才遭特务暗算;甚至连一批大